

從去殖民角度看博物館與原住民
社群合作知識生產之道：
以白鷺部落文史書製作為例

林頌恩¹

Cooperation between Museums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colonization:
An Example of the Publication by the Payljus Tribal Community

Sung-En Lin/Siōng-un Lâm

關鍵詞：去殖民、博物館與原住民社群、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白鷺部落、排灣族

Keywords: Decolonization, Museum and Indigenous Community,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Prehistory, Payljus Tribal Community, Paiwan Tribe

¹ 本文作者現任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展示教育組研究助理／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Research Assistant, Division of Exhibition and Education,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and Cultures, Dong Hwa University.

Email: senayant1@gmail.com

(投稿日期：2012年9月27日。接受刊登日期：2012年12月14日)

摘要

最早為博物館使用的知識，可說是由殖民帝國派遣人員到遠方採集、搬運回國後經由分類、建檔而得來的資料，此類知識則供予殖民勢力運用。這類藏品蒐集與知識生產的方式，也顯露長期以來研究者面對原住民部落社群於知識建構累積發表上的不對等關係。原住民期待研究者能對部落存續負有蒐集保存資料的責任，並共同發展建基於從研究而可掌控原住民自身命運的工作關係。本文透過去殖民主義觀點，從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於排灣族白鷺部落建構部落文史書過程中擔任協力角色的實踐結果，進行實例分析與探討。本文研究提出省思博物館與部落合作知識生產之道，可著力於（一）博物館與部落發展互為主體的夥伴關係；（二）博物館成為培力部落研究者的研究機構；（三）博物館作為出版協力以落實版權為部落集體擁有的作法。博物館當可作為「發電廠」而非「儲藏室」之角色，從中進行能量與知識的交流運輸，促成各部落形成自己的知識中心。

Abstract

Early on, the knowledge used by museums was gathered, transported, classified and archived by personnel assigned by the colonizing power. This knowledge was then provided to the colonizing government. This type of specimen gathering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reveals the unequal relationship that has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in obtaining, archiving and presenting research o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digenous communities expect that researchers will continue to fulfill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collect and preserve data, as well as jointly develop a working relationship that will allow the communities to use research to control their own destiny. In this study,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are carried out on the coordination role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in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al writings

by the Paiwan tribal community of Paylj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onialism.

This study proposes several concepts regarding museum and indigenous community cooperation in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1) Museums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need to develop a mutually reciprocal partnership. (2) Museums ne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cultivating indigenous community researchers. (3) Museums need to join in the publication effort to ensure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mains the collective property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Museums should play the role of “power house” rather than “store house”. They should provide the “energy” or capacity and the means to exchange knowledge, as well as encourage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o set up their own knowledge centers.

前言

長期以來，博物館界、學術界、公家單位與原住民社群合作的方式，多以原住民作為資料提供者、報導人、受訪者，有些研究者將從原住民處訪談、詢問、翻譯、調查得來的知識，建構為自身撰寫的文章、文案、計畫、書籍、單位成果出版品等。有關原住民知識的建構過程中，原住民多半被視為提供資料的客體，而非擁有權力詮釋自身知識的所有者與掛名者而被邊緣化與他者化。

在以民族學為核心知識的領域裡，長久以來進行原住民知識研究的多半是外來人類學者。外來學者與本地原住民之間就知識建構上具有一種相互需要的矛盾關係：學者需要原住民的知識作為研究的內容，靠著這些書寫出來的知識，原住民的知識得以被口語傳播、身體實踐之外的載具與技術保存與流佈。然而這之間亦呈現雙方於知識生產間權力的高低落差。

同時身兼研究機構與社教機構雙重性質的博物館，處在今日此一後殖民時代，可以如何採取去殖民觀點與原住民社群生產知識，以反省、實踐、逆轉此一所謂被研究者與研究者之間的傳統關係，而將知識系統建立的依歸，真正回歸予部落作為主體角色？本文將透過後殖民主義觀點，從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於排灣族白鷺部落建構部落文史書過程中擔任協力角色的實踐結果，進行實例分析與探討並提出省思建議。

遙遠他者來至當地人所處環境的知識生產方式

欲探求最早為博物館所使用的知識從何而來？就要先理解博物館之成形乃伴隨殖民主義征服非西方而形成搜刮物件與聚攏查考知識之處。若以 Edward Said 針對大航海時代以來，所謂相對於西方為他者的東方知識如何被分類、建立檔案而產生的方式，可快速一覽得出以下印象（王志弘等譯，

1999: 10) :

在東方知識的標題之下，自十八世紀末以降在西方對東方的霸權大傘底下，漸漸浮現了一個複雜的東方：它是適合做學術研究的，可在博物館中展示的，可以在殖民者辦公室中重建的，可以在人類學、生物學、語言學、種族及歷史論文中幫助說明人與宇宙的關係……

此知識在一霸權結構下被重建、再現於展示的研究以作為說明，是一種科學導向不帶情感也未與當地社群產生更多交流的知識，因為這知識是在外人帶離其原先所孕育之地而建構形成。

一、將「土地」搬運走的調查方式

這就要探討此種知識生產的模式，乃是殖民者透過探險隊踏查認識與自己統治環境各項差異極大的遠方而來。Bruno Latour 曾以 Jean-François de La Pérouse 於 1787 年到東太平洋庫頁島一帶進行探險過程為例，生動呈現這類當地知識如何被採集建檔而在之後為服務殖民主義的單位所運用。

Latour 仔細描述該船隊如何帶領大批專業人員及工具前去，行使各項調查，諸如以鐘錶計算經度、以羅盤來估算緯度等基礎資料，其用意都在於「更精確地」(more accurately)掌握所能丈量的資料(Latour, 1987: 215)。靠岸後，植物學家、礦物學家、自然學者隨即上岸採集，能帶的就將之帶走，帶不走的如過於笨重、過於脆弱、或離開當地後難耐長途運輸而無法存活的採樣標本，則由藝術家繪製下來。這些成冊的資料便被蒐集起來由 Barthélemy de Lesseps 送往遠端的帝國(Latour, 1987: 215)。Latour (1987: 217)非常反諷地指出：

為什麼他們（按：意指調查者）都這麼匆忙？如果他們對這個島嶼這麼感興趣，為什麼不多停留久一點？不，因為他們對於所在的地方不怎麼感興趣，感興趣的是先把這個地方搬回船上，其次是搬到凡爾賽。

Latour 點出此一實情，即這群踏查者未對當地抱以任何情感，純粹在乎完成掠奪與搬運一事，顯現出調查背後更大的目地就是將所得成果回報予資助探險隊前來踏查的帝國。

至於這些被帶回去的筆記、書籍，內中的知識可以轉化給下一位前來此地的踏查者，他們便可從離當地極遠的家鄉先行取得該地知識。

「新的領航者要進入該海灣，該地最重要的特徵第二次就全被看光了一第一次是在倫敦時閱讀 La Pérouse 的筆記，並思考 De Lesseps 帶回去凡爾賽的地圖」。(Latour, 1987: 217)

Latour 以此說明，對比十年前來到此地的探險家，其在地知識比起當地人還不如，但光憑一次聽聞對方而寫下的知識、或是當時迅速採集回去的資料，等到十年後，這份記錄就能成為下一位踏查者所擁有的已知之事。

Latour 不斷標明，這種把土地「帶回」去的方式，讓這些原本比起本地人應屬相對弱勢的外國人，甚至在家鄉辦公室抽菸閱讀即可掌握當地情境，而讓他們未來移動到當地時已能預先知悉相關事物而可變得相對強勢，這說明了知識累積與散播的重要性。

二、「資本」成為知識累積的循環

如是一來，對知識的認知不能只看到形成的結果，更要回去探討知識被累積的方式。Latour (1987: 220)指出：

如我們所見，要定義所稱為的「知識」，不能不去理解得到知識的工具方式。換言之，「知識」並不是某些可被它自身描述或者是「輕忽」、「相信」的對立面，而是要被理解為一整個累積的循環(a whole cycle of accumulation)：如何將事物帶回一個地方給某些人首次看到，其他人可能被再次派去帶回其他東西回來。

如何讓遠方的人熟悉那些他們不曾見過與得知的人、事、物，Latour 指出，就是這樣透過工具與方法，一次次將材料帶回地圖上「新領域」(new territory)的部份物件，累積於中心去分析而形成知識。不過他又持續詰問，稱這種被累積於中心之物為「知識」、或「權力」、或「金錢」、或「利益」，顯然都是不當的用語。但若稱為「資本」(涵括諸如金錢、知識、功勞、權力)，他認為或許就不會是不當的字眼，因為這會形成可持續注入其他累積循環的某些事物(something)，是可以被帶回來的(Latour, 1987: 222)。Latour (1987: 223)稱這種作法為「遠端操作」(action at a distance)，其進行方式便是：「藉著某種方式(by somehow)，把這些不熟悉的事、地、人帶回來。」達成的方式便是：

發明一些工具技術(means)，(a) 將之變成可移動(mobile)就可被帶走；(b) 保持其穩固(stable)就可以將之來回運送而不會產生變形、腐敗或朽爛；(c) 使之可組裝化(combinable)，如此一來不管它們是由什麼所構成，都能夠被堆積、聚集或攪亂重組像一副撲克牌。

這類從遠端操作、控制的方式，就使得中心(center)可以掌握偏遠之地(faraway lands)，產生了「哥白尼革命」，意指「進入科學的穩健之道」(enters the sure path of a science) (Latour, 1987: 224)。另一種與知識生產累積同步帶來哥白尼革命的作法就是採集蒐藏品。而這些可被支解帶回去組裝的物件，Latour (1987: 225)是這麼解釋他們的命運就在博物館被終結：

就算是那些可承受旅途的物件，例如化石、岩石或骨骼，一旦存於建造在中心的少數博物館地下室時，就可能會變得沒有意義，因為沒有足夠的脈絡附加其上。……。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動物學家，打開幾十個抽屜不需旅行超過數百公尺，就遊遍了所有的大陸、氣候與時期。他們不需冒著生命危險在這些新的挪亞方舟裡頭，僅苦於熟石膏帶來的灰塵及污點。

最後這些存放於研究與蒐藏單位的資料，可讓非當地人更理解當地，使

得原本對當地知識不了解而處於弱勢的外人，有可能反過來成為當地的宰制者。對於西方博物館知識與物件之來源，Latour 以事實及知識循環累積的圖形提供吾人基礎的概念（圖 1）。這些被建置的知識，按 Latour 的說法，如能加以掌握將助於翻轉彼此宰制關係的方法，所造成的結果便是(Latour, 1987: 227)：

一小群男女，藉由瞄一眼就能掌控這些事務，其中一個理由是，它們都以紙張平面形式可成檔案、釘在牆上、與其他相結合，它們都有助於翻轉介於宰制者與被宰制者之間力量的平衡。

三、思考逆轉知識建立的新關係

臺灣在日本統治下開始形成認識臺灣的知識體系結構，基本上也不脫 Latour 所言搬運、調查、建檔模式，即殖民權力透過大批調查來建立知識以作為統治臺灣的治理性。這方面，姚人多（2001）有非常清楚的論證。儘管姚人多主要以 Benedict Anderson 於《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所提，人口調查、地圖繪製與博物館於殖民地扮演國族主義的重要性（吳叡人譯，1999：195-200），而單就日本於臺灣前兩項的作法進行仔細探討而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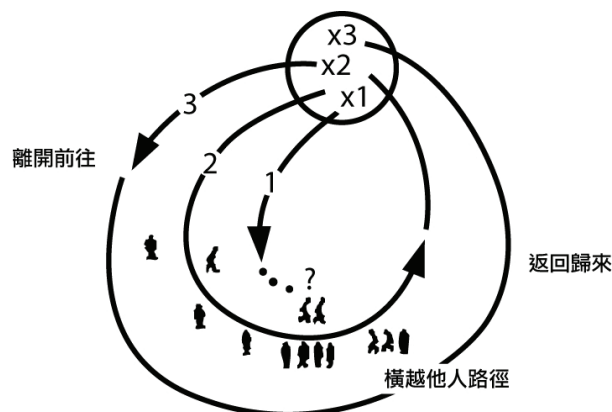


圖 1 知識為累積過程之循環（資料來源：Latour, 1987: 220）

處理博物館部分，但仍可從中看出，當時日人於臺灣進行全面調查之程度，並經由這些調查結果來管控被殖民者。

因而面對這些承繼自殖民體系產生的原住民知識，丘延亮（1997：171）認為不能照單全收，而不對背後的歷史理脈進行解構分析：

對這些文獻的閱讀若僅止於「文本」的層面則必生「祀為神聖」的拜物自誤，終為殖民主義宰制還魂服務與培力而不自知。質言之，一個以在地為主體的祛殖民人類學之建立，似乎必須以吾人的思維祛殖踐行始。透過對人類學的祛殖化才能一步步得以企及。

那麼在博物館這樣一個場域實踐祛殖（解殖／去殖，decolonization）人類學的作法，可以如何解構原先獲得當地知識的取得方式？王嵩山以 Paul Connerton 區分記憶有兩種操作的模式為例：一為合併的(incorporating)操作機制，只能透過身體活動時進行訊息的傳遞；二為銘刻的(inscribing)操作機制，透過例如照片、印刷、錄音等銘刻他物的機制捕捉、儲藏訊息以留存，使訊息可超越人體傳遞的時空限制。他指出，依照 Connerton 的概念去分析，從合併轉換到銘刻的操作依賴不同的新知識能力，也可說是從變通實用的「地方知識」轉向「學院知識」，「對一般知識進行廣泛的、意識性的、累積性的考慮」，則「博物館可能通過不同的主體建構出個人記憶、文化記憶、社會記憶等不同層次的地方史知識」（王嵩山，2005：31）。可見得，博物館可以參與當地從合併機制所產生的知識，轉化為銘刻機制對知識的建構方式，而助益地方於其知識之積累與成就。

那麼，當我們試著重回 Latour 所提大航海時代，即當地住民首次與遙遠外來研究者初見面建構知識的場域，來逆反重看今日雙方建構知識的關係，則外來研究者能否反過來，轉為將上述銘刻方式於累積知識所需要的工具、技術、方法等循環帶至當地，與當地住民並肩建立當地知識，而使當地知識直接服務當地社群所需？

換言之，當外來研究者不再將所產生之知識帶回自己的中心，而是讓該

知識生產中心直接於當地社群形成；不再透過強化自己中心的中心性，而邊緣化其他原來知識來源地的位置，而是共構數個可互通有無、就地於在地形成各個可確保其主體性中心的多中心體系以保持平等關係，那麼如是一來，則 Latour 所言稱之「資本」，可以形成當地積累之物、成為當地社群可使用之資產，就不會再輕易墮入丘延亮所謂為殖民體系與權力服務的知識，得以逆轉長期以來研究者與原住民部落社群於知識建構累積發表上的不對等關係。

原住民所期待與人類學者間的關係——以加拿大一份訪談資料為例

吾人先將上述質疑與可能作法放在心上。暫且先來看一份訪談資料所勾勒出原住民對於人類學者的看法，這是加拿大境內曾經歷大學／碩士訓練並與人類學者共事過的三位原住民 Ron Ignace、George Speck 與 Renee Taylor，接受 Noel Dyck 訪談所指出原住民對於人類學者的一些觀點，其中有責備亦有期許，在此僅列出四個子題作為相關參考與思考之引發。

一、人類學者對原住民社群負有的責任

Ignace 以「猶如破杯」(like a cup that's broken)比喻原住民今日面臨的問題，意為原本治理傳續自己的生活方式與環境崩解，使得各種問題隨之而來。面對這類現實困境，Ignace 認為(Ignace et al., 1993: 171)：

對部落及原住民領導人負有責任的人類學者，能夠協助我們把杯子修補起來，以系統化及科學化的方式訪談長者，為我們把杯子修補好(putting that cup together for us)。年輕的世代並不總是有此機會或技術來向長者學習，因我們已跟老人家疏遠了(being alienated)。人類學者可以為我們做這件事情(Anthropologists can do that for us)。

Ignace 認為掌握調查寫作技術的人類學者還來得及把握機會向仍在世長者訪談，可以成為補破杯者，為日後年輕世代留下資料。Ignace 引用老人

說出的憂慮，當有一天年輕人覺醒時想投回母體懷抱卻無所憑靠，當他們想知道自己該何去何從，此時「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經由個別人類學者所做、從長輩那裡蒐集得來保存的資訊」(Ignace et al., 1993: 171)。

Ignace 所言屬實，然而轉向思考，若此一補破杯者正可以是自己部落族人，那麼當年輕人欲探求自己部落資訊時，不就是正在向自己的長者請益？此一連結族群世代情感的鍊結，便不會因為學者身分歸屬外人而有所隔絕或斷裂。因而若能培養族人產出自身研究者，則可減少須倚靠外力才能補破杯的困境。

二、經過人類學調查所生產知識的正式效力

往昔沒有文字記錄的原住民，能從人類學者調查寫作自己社群所得知識做何用途？Ignace 提到他們 Shuswap 族如何看待與人類學者的合作及其研究成果(Ignace et al., 1993: 167)：

他們（按：指原住民）是將對方視為重要的構成，能夠用以詮釋在社區拿來作為自身捍衛其他形式的人類學……這幫助我們能用以證明我們所說的信用，經由他們（按：指人類學者）代表我們成為專家證人，以合法化我們所說的(legitimize what we're saying)。

Ignace 舉例提出過去原住民欠缺文字記錄的困境，曾有法官在法院判決上不相信長輩口說所提歷史，認為並非明文寫出就不視為合法正當歷史(Ignace et al., 1993: 167)。同樣都是向長者請益而來、整理由長者口述的知識，只因未依照習慣以文字作為主流社會白紙黑字契約型態的文本將之出版，就被法官視為無效知識。換言之，族人若能以群體方式將自行生產出的有效知識文本化進行出版，在代表自己成為專家證人合法化其所言時就有明證。

至於在此強調群體而非個體，是因為個人有時會站在自己或自身家族之利益或立場撰文，為求謹慎，有些有關部落深層權力分配相關事務若所成文

本能在部落集體共識下達成，則較能符合部落社群集體利益。

三、版權所有者為部落社群而非學者個人所擁有

前述提及撰寫出版若能以多人集體方式進行，所產出之社群知識在以部落共識為前提下出版，是符合社群集體利益之事；同樣的，產出成果版權若能以族人為集體共享權對象，而非落入研究者個人或其出資單位，亦較能符合公平正義問題。

對於這點，Ignace 提到，老人家會儘可能把真確的族群圖像提供予他們感覺能信任的人類學者，因為他們想被外界真正認識。因此他們會這般詢問想跟他們合作的人類學者，視其回答結果而篩選合作對象：「『除了學界出版的目的，你準備拋棄所有的版權嗎？(Are you prepared forgo all copyrights except for the purpose of academic publication?)』如果他們答以不，那麼後面就不用再討論了。」Ignace 說這是 Shuswap 族人與學者合作的立場，他們要找到能信任的人來合作，才能信任所產出之資訊，以避免學者傳達錯誤圖像予世人(Ignace et al., 1993: 171)：

我們相信他們（按：指人類學者）是因為我們要 Shuswap 族人的圖像是被真確呈現予全世界的，因為我們想要為人所理解，我們自身是何人、我們的希望與激勵為何。

這裡提到原住民對於人類學者生產部落社群知識的期待。學者為了學院著作及相關目的進行研究調查、進行學術發表，本為其學者之道。然而學者能否在學術目的之外，願意主動拋棄該份源自所研究社群的知識版權，直接讓渡予該部落社群自主利用或另行使用，而不提擁有版權一事，這之間實為考驗。

當族人對於激勵自身與後代而透過知識呈現之自我圖像懷抱另做己用他途的想法時，一個個外來研究者及其所屬單位願否、能否以協力者身分參

與其中並拋棄該版權，好將這些四面八方的知識成果匯流於族人社群而非個別宣稱其所有權，則對族人協助學者生產知識以獲得相對於自己社群傳續的知識而言，相信更能產出雙向回饋的作用。

四、原住民與人類學者共同發展工作關係

除了 Ignace 強調版權問題，另一位受訪者 Speck 亦表示人類學者應重視此版權議題對於原住民社群之重要性(Ignace et al., 1993: 174)：

人類學者一定要尊重版權的議題，因為那是我們能維持掌控的方式。我們正試著朝向一個開始控制與管理自己命運的時代。這是其中一種做法。是有其他的方式，但如果我們能發展建基於這些方式的工作關係，我想我們能夠這樣合作下去。

這裡反映的是，知識產出成果之版權能落在族人群體手中，才能讓族人掌控該知識成果、管理自己詮釋要如何被看見的主導性。Speck 認為，若人類學者能試著與部落社群合作發展此一工作關係，讓部落能經由保有所生產知識之版權來控制自己想發展的方向，如此一來所謂外來學者與當地原住民之間於知識生產面權力不均等的問題亦可打破，兩者間可發展出互惠彼此的新關係合作下去。

以上四點呈現原住民期待與人類學者之間合作的新關係。無獨有偶，孫大川以其身為原住民面對人類學者複雜、矛盾、尷尬的感受指出，臺灣原住民在人類學者經過調查、分析、命名、分類成為認識對象，然而若學者對待原住民的態度是屬於蜻蜓點水式的研究，那麼「人類學者所投射的『光明』，是為所謂『學術自身』或是以了解『原住民』為最終目的，便是值得認真考慮了」(孫大川，2000a：213)。因此他期待往後的學者「能進一步將其『學術』的『承諾』轉化成對原住民的承諾」(孫大川，2000a：214)，將焦點從做研究本身，轉為以原住民為主體而了解其需求，再將之化為對原住民而言有意義的研究生產。

以上四點與前述理論，為以下白鷺部落與外來研究者進行知識生產的方式與意義帶來可茲討論的前提。接著便以白鷺部落文史書之成形與過程，探討族人寫史的意涵及博物館參與其中的作法。

白鷺部落文史書之成形過程

白鷺部落(Payljus)位於屏東縣來義鄉南端，行政區域屬南和村，以屏東縣來義鄉白鷺社區發展協會（以下簡稱白鷺協會）作為代表部落的主要立案人民團體。醞釀白鷺部落文史書之成形，並非始於 2009 年與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前館）進行合作計畫當年，而是早在 2007 年年初，部落就已召開籌備會議。儘管當時到場者人數踴躍，後來也達成推動小組等共識，但並沒有正式展開運作；即連 2008 年經由協會提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已獲申請經費補助，但也因為沒有正式啟動而必須行文以示放棄該筆款項，成為族人心中憾事（陳文山，2010a）。

與白鷺部落對應文史製作的史前館研究人員為筆者。2008 年筆者以志工身分與另一部落合作文史書編輯出版後，開始認定部落文史出版重要性而將之納入館內與原住民社區合作的業務。由於白鷺協會總幹事同時身兼屏東縣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駐館規劃員身分，與史前館研究人員先前曾有相關策展及教育活動合作關係，在史前館尋找文史書合作夥伴時表露高度興趣，因此透過當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文物館活化計畫當中一項「大館帶小館」計畫進行合作（林頌恩，2010a），此一協力可說是首度開啓國內博物館與原住民地方文物館之間就部落文史調查撰寫進行出版的作法。

一、參與部落文史書寫之主要成員與分工方式

文史書的主要資料採集編寫整理者有兩位，年輕一輩為安鷺山·巴里福樂（*angusan palivulj*／陳文山），即協會總幹事與文物館駐館員。他是部落裡少數幾位四十歲以下尚能以流暢母語與長輩溝通的中青輩，國小時不常講

國語、上課聽不懂老師說些甚麼，曾因在校講母語被掛上「禁止說方言」的掛牌。然而這種不諳國語的過去，反而促使他在母語聽說方面保持不錯的能力，能在進行調查時以母語直接與長輩對話，之後再轉譯書寫成漢語文字。整個成書過程中，他親自打點大小事，包括聯絡訪談、召開會議、錄音錄影、蒐集編寫、拍攝挑選提供圖片等，幾乎把家庭生活都拋到一旁全心進行，同時也面對許多來自部落內外的壓力，例如被認為製作文史書是否懷有個人私心等。

另一名重要編寫者為退休員警嚷阿嚷·祿璞峻岸 (*drangadrang rupeljengan* / 林時吉)，他不僅提供所寫收藏手稿、調查訪談相關資料，也在家族會議與各家族代表到場的部落會議當中擔任翻譯。嚷阿嚷身為部落五大家族之首佳馬嘉岸 (*tjamatja'an*) 家族的管理成員，以其德高望重輩份協調斡旋諸事，對於內容終能成稿定案給予鼎力支持跟協助。這兩位族人分別以不同年齡層及所擅長的部分逐一書寫整理出內容。可以說，沒有他們兩位作為第一線的調查與書寫者並分擔各項工作，該本書不可能完成。

外來研究者方面主要有兩位，一為筆者，負責與安鷺山之間雙向來回整合部落資料，主要負責文稿潤飾與文段安排，使之從調查內容的初稿轉為具邏輯發展的章節書寫文稿，並配合田調釐清所需來回白鷺部落參與校稿討論會議。後端則與美術設計師就排版結果進行來回修改、校對，最後協助部落協會向國家圖書館申請 ISBN 程序及印製出版，安排出書宣傳的通告。

另一位重要參與者為高中歷史老師林文正。他與白鷺部落的淵源起於班上有該村學生而建立了關係，為人熱心，因此在總幹事邀約下加入尋索白鷺部落以往曾出現在他者角度所寫官方檔案中的身影與數據等（例如荷蘭、清朝與日治時期檔案當中有關該部落片段敘述、教育資料或物產背景等檔案資料），以這些所謂白紙黑字的明文資料，作為書中支持長者口述內容的背景史料。

先前白鷺部落想進行文史調查卻無法上軌道展開作業的問題，在兩位研

究者投入協助後，加上部落不願再次失去出版契機的積極努力，遂展開密集的調查、會議、討論與書寫。甚至其中以往存於部落家族勢力之間難以明文交代的內容，都因此歷經不同立場的爭執、捍衛，工作小組於彙整各家說法時亦謹慎推敲，希望能在重視各家族立場下亦能盡量降低爭議，以免因出書而引起部落內部不和反而得不償失，而在最後能夠達致仍可接受的地步，過程極其辛苦。對此終得將知識明文出書的集體成果，各家族耆老可說非常滿意且珍惜。

二、在自己部落田野：原住民研究者實務中的養成

在此要特別提及安鷺山於研究能力的成長。安鷺山為高職電機科畢業，然而他在文史研究與書寫方面所做到的成果，不僅超越他以往所學，也驗證了部落青年只要有心投入文史紀錄行列則學經歷都不是造成限制的問題。在這個來回書寫的過程中頗類似論文寫作，博物館研究人員擔任類似指導老師的角色，根據安鷺山所編寫內容的敘事提出疑問或須增加說明補強之處，再由安鷺山釐清是書寫上的問題，亦或有疏漏之處須再向長輩求證補足，如此反覆進行。潤飾成文之後的內容，則經雙方討論章節的編寫安排，裁切使之成形。

不同於嚷阿嚷曾經生活在與部落長輩密切互動的那個年代，對安鷺山而言，他的成長年代甚至是他的下一輩，已經在面對失去與母體文化連結的嚴重考驗。對於嚷阿嚷而言，他是把自己曾經生活過的年代、聽過的故事交代出來，因而所述說的世界不會離他的生命經驗太遠。

然而對安鷺山而言，有許多事物甚至是箇中奧秘之處是他首次聽聞，換言之，他正在趁著這個調查部落文史的機會，重新去認識自己的文化，以一種研究的層次與高度來重新看待、認知、梳理自己族群的文化。因此對他來說，他正在利用文字書寫去經營他所應擁有但諸多已失去或快失去的記憶，而努力地想把這些紀錄下來傳給後人。

安鷺山在這個研究自己部落文史的練習過程裡，獲得他沒有在以往學校教學體制所能學習的研究能力，他不僅從中自習相關技術，也於日後提供鄉內從事文化書寫者協助。對他來說，在部落調查、練習書寫且與研究人員來回討論逐一完成確認定稿的歷程，可說像個初入人類學界的新生人在「異鄉」田野，經歷他成為研究者的成年禮（陳文山，2010a）：

把老人家所講的話記錄下來，這個動作聽起來好像不難，但是我們不要一直以為這是個簡單的任務，就像當初我也曾經這樣認為。重點是做出來的紀錄有沒有客觀性、有沒有正確性、有沒有在地性等問題，過程中遇到意見不合或說法不同的情形，就要去真實面對，甚至去交叉比對、多方考證、費心整合才有意義，並且尋求大家可接受的最大範圍。

因而從這裡可以看出，以往人類學者要求到異地不同文化進行田野，才是踏出身為人類學者的第一步。而在安鷺山的脈絡則是，身處於跟過往「生活世界」斷裂的現實環境，他不用到異文化學習如何成為人類學者，就已經是身處某一程度的異文化裡頭。因而學習研究方法、養成研究能力，反而是讓他能夠與長輩進行交流、更親近母文化的方式。

三、從生活世界失根轉向書寫世界的紮根

面對前述原住民青壯輩已與部落知識產生斷層的問題，孫大川明白表示，原住民今日歷史斷層的真正元凶，並不在於有無「文字」以承載歷史的問題。他指出：「問題的關鍵，恐怕還是在原住民『生活世界』的喪失這一件事上。」（孫大川，2000b：81）意思是指，原住民賴以生存的祭儀、風俗、制度此一為集體傳遞的載體瓦解後，原住民就喪失了境遇感而失根。面對這樣的失根漂流感，要於現實環境中恢復原先那「生活世界」有其難度，然而若是嘗試建立歷史書寫的場景，至少在翻看書本的那一個世界時，可以看見屬於由白鷺部落觀點所建立的生活世界。

該書於寫作上力求符合學術體例，希望能讓年輕一輩在閱讀上感到通順不吃力，至於內容可從其編者序簡要一窺（林時吉、陳文山，2009：5）：

本書的特色在於大量採用耆老口述的資料，以部落族人觀點呈現自己的故事及歷史。內容分為歷史篇、社會篇與祭儀篇三大類。歷史篇講述部落的遷移史以及各時期的發展，同時佐以各項史書關於白鶯部落的記載；社會篇介紹部落管理家族事務運作及分工的人際結構組成，並且詳述五大家族等相關家族史；祭儀篇則深入介紹部落重要的四大祭典，透過流程與意義的詳實紀錄，希望這部分可以成為未來教育青少年了解以及參與祭典的基礎資料。

從這裡可以看到，部落知識的出版，主要是為了傳接給下一代認識並有所參考使用（尤其是部落史與祭儀運作的內在規則），而不是為了累積成就研究者的研究成果。這是區別族人自身進行研究及外人前來研究兩者間一項很大的差異。

就該書以漢字寫成，而非以母語書寫出版一事，或許就原住民保存母語上有違其主體性建構，誠為可惜之處。然而換一個角度來看，前述孫大川所強調的「生活世界」，他認為語言或文字不能單獨存在，其質感「必須有一個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來支撐」（孫大川，2000b：95），說明當原住民依其原先日常生活型態所形成的傳統生活，正因現在日常生活變化而崩解了過去的生活世界，那麼以今日生活世界所使用之漢語來書寫，未嘗不是原住民從事歷史書寫的另一種實踐戰略。既然無法無視於此一現實，孫大川（2000b：96）如是勉勵原住民：

相反地更應當勇於「書寫」，激發創造力，介入廣泛的「生活世界」，進一步開拓更遼闊的共同世界，一如美國黑人的文學和音樂介入美國文化成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樣。

按照孫大川的說法，若原住民以漢文書寫介入臺灣主流社會、使之於閱讀吸收上無語言障礙而能更認知原住民的世界觀，也是一種介入臺灣文化使

其無可分割的作法。儘管《炭火相傳》一書於書末跋文表明，最想出版的是母語版文史書，但該書以漢語寫就並含帶大量母語單字書寫，也未嘗不能視為一種介入臺灣文化的作法，促使更多非排灣族讀者了解該部落。而對於目前更多沒有能力直接閱讀母語作品的白鷺青少年而言，這本書的出版，多少補強他們能以漢字得知有關部落事務的知識，因為這是學校體系不會提供或教導的內容。

總而言之，部落族人經由自行建構部落史而在做中學的作法，讓安鷺山不用遠離家鄉到外地求學去學習相關技術，而是能在有外來研究者不斷往返當地協力下，就近於同一生活環境進行實作養成，蓄積部落建構知識的資本，以逆反前述 Latour 所提由外人到當地把知識帶走而建立的程序及方式。在這方面，身為研究建構的博物館，不管是本於收藏或展示而有需要產出研究的同時，如何透過創造更多這類可相對靈活促進族人於部落進行研究的養成方案，還有更多可以討論的空間。

從後殖民觀點省思原住民研究的知識建立

Graham Hingangaroa Smith 定義何為以紐西蘭毛利人為本位研究的 Kaupapa Maori 研究時指出，所謂毛利研究是指：一、跟「身為毛利」有關；二、與毛利哲學與原則有關；三、視毛利正當性與合法性、語言及文化為理所當然；四、攸關「為了我們自己文化福祉全面自治的奮鬥(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 over our own cultural well being)」(Smith, 1999: 185)。參考 G. H. Smith 的定義，我們可以將毛利研究轉換為原住民研究的概念，可見得，研究很重要的作為是要促進原住民掌握自身的自決主體。如是一來，在眾多研究領域中，有哪些是攸關原住民終極自主自治亟需建立研究的知識？

一、最重要的原住民研究議題

Linda Tuhiwai Smith 以 Kaupapa Maori 研究面向指出他們目前最關切的

領域與主題(Smith, 1999: 191)：

目前我們並不關心核子物理，但我們對遺傳科學越來越感興趣，有完整的理由（說明）為什麼我們對於教育、就業、健康與歷史感興趣。這每一項領域都使我們處於危機中(situates us in crisis)。這些更為真實並更為緊迫。

Smith 直接表明，這是因為這些領域都直接與民族生存延續有直接關係。此外她並以泛太平洋原住民視海洋為生命給予者的觀點，以洋流與退潮衰落的隱喻，標示出一張「原住民議題研究」(The Indigenous Research Agenda) 圖示，註明四個代表進程的四方「醫治、去殖民、轉化、動員」(healing, decolonization, transformation, mobilization)（而非自身之起點或終點）。

這些過程可結合成實踐與方法學，同時彼此連結、釐清處於地方、國內、區域與全球的緊繃狀態。接著就是 Smith 強調以同心圓型態而成的四個主要潮流：「生存、恢復、發展與自決」(survival, recovery, development, self-determination)（其中自決為同心圓最核心），這些是原住民社群前進的狀態。生存方面，指的是身體、語言、社會與精神實踐、社會關係與所有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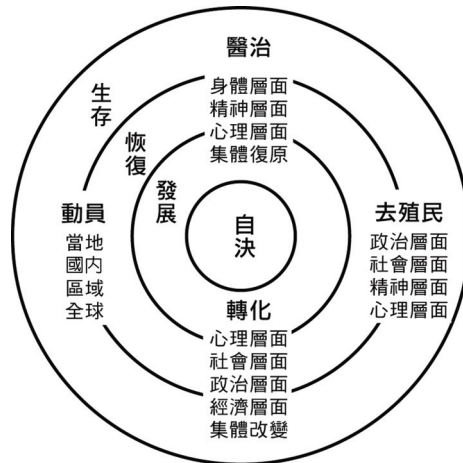


圖 2 原住民研究議題圖示（資料來源：Smith, 1999: 117）

優先技藝；恢復指的是有關領土、原住民權利與歷史等當務之急以回應生存危機。由於以往在西方，原住民的研究分類都被視為「非人類」(non-human)，因此以「造福人群」這個角度來看，就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而這是原住民所需要的研究類型(Smith, 1999: 116-118)。

如是一來，就博物館發展面向來說，尤其是以人文、歷史、藝術、民族學為主要類型的博物館，有哪些核心業務，是可以最直接與原住民所需造福人群與社群研究最攸關的部份？以消去法來看 Smith 所提的重要研究面向，則教育與歷史面向可說是最接近的部份，整理原住民史料並將其成果或建置過程作為動員部落老少以進行對下一代的教育，可以說是在操作中，就失去歷史的存在感進行醫治、恢復歷史記憶與達致轉變的作法。

二、去殖民戰鬥：原住民進行自身歷史研究

從這裡可以看出，原住民進行自身歷史研究、積累發展以族群與部落意識為主體的作品，可以是重要的去殖民作為，這可以逆轉以往由非原住民為原住民寫史詮釋的結果。這一點，Said 就被殖民者意欲行去殖民化以反抗帝國殖民者所加諸影響之作為，而指出最好的方式，就是被殖民者在殖民者將其征服的疆域上進行戰鬥（蔡源林譯，2001：396）：

佔領在帝國的文化形式中被保留作為臣服之用的場所，具有自我意識地佔領之，在這個過去被一種假設已規劃的劣等他者之臣服意識所統治的相同疆域上進行戰鬥。然後，**重新銘記**(黑體字為原作者所加)。

如果在以往，原住民的志書、文史等是被外來研究者調查詮釋以其名字為出版、以其所資助研究之機構單位為版權擁有者，那麼原住民現在要做的便是在同樣的疆域上重新銘記，寫下由自己所調查的內容並做出以自己名字為作者名、以自己部落群體為所屬出版單位的出版品。Said（蔡源林譯，2001：400）認為，被殖民者勇於向殖民者提出這類以自己為主體的參與攻佔法，乃是一種反抗帝國宰制文化做法而有所介入的運動，對於長久以來處

於不平衡關係的兩造之間都有助於重新思考：

這些介入，不只是運動的一個整合部分，而且從許多方面來看，這個運動成功地指引著想像、理智和形構的能量，重新看待與重新思考白人和非白人的共同藩籬。對許多厚顏無恥的西方人而言，土著之重新佔領疆域，實是無法想像的。

由原住民自身書寫自己部落的歷史，就如 Said 於反抗文化書寫中所學的主題，那不只是在一個領域上進行書寫而已，而是從中展現宣稱的企圖與奮鬥的力量：「企圖宣示對一個區域掌握復原和重新賦予活力之權威，所展現之令人驚異的文化奮鬥。」（蔡源林譯，2001：399）

而這個力量，會帶來賦予活力之權威，也就是前述 Smith 所強調「恢復、復原」等活化自我民族生存的力量。Said 於《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反抗文化的主题」此一章節引用 George Lamming 的說法，舉例非西方作者以自己觀點重寫莎士比亞《暴風雨》一劇時，以前被視為服事他者可有可無的卡立班一角若要擺脫受殖民的心態與狀態：「則卡立班必須呈現出可以被人們所認知到的屬於自己之歷史，且是由卡立班自己努力的結果。」（蔡源林譯，2001：400）換言之，原住民若要擺脫為他人所詮釋的歷史，那麼自己同樣要有所努力，以呈現為人們所認知那屬於自己詮釋自己的歷史。

在此指的「努力」，筆者認為可以分成很多層次。最基礎的，便是學習一套用以記錄的方法跟模式、學會整理分辨零散的口述內容逐漸成為有系統的脈理、理解長輩的口語敘述並進行書寫轉換、付出時間精力與種種相關代價等等。如同卡立班想要扭轉自己被定義的命運，後殖民時代的原住民若要進行歷史述說權被殖民情形的去殖民作為，那麼就主體性而言，非原住民不能也無法代替原住民自身進行這類相關研究，而是由原住民自身來努力達致。只是這條努力之道並不表示原住民必須亦或只能單靠一己之力來進行，而是可以借力使力，從諸多相關機構的協力計畫獲得培育自身能力的資源。如果以這個眼光來看待，則博物館正可以是展現眾多資源管道的其中一處。

研究與知識建立之於原住民

然而再進入博物館能提供原住民社群哪些資源管道從事研究而達去殖民之道以前，有必要先認識以往博物館及學術研究給予原住民社群的傳統印象，以及原住民自身進行研究對其社群之意義所在。

一、「研究」之於原住民所代表之負面感受

博物館與原住民社群的互動，不論是就展示、教育、研究與典藏等傳統典型功能，所會牽涉採用的部分都與研究具有密切關係，也都以研究為基礎而出發進行轉換。前述以往博物館是這些從原初地被切割脈絡運至他鄉進行研究的物件積屯之處，而其所使用的語彙「蒐集」(collecting)，則是令原住民感覺厭惡的行為：「許多原住民可能會稱為『偷竊』(stealing)而非蒐集，這包括領土、植物與動物的新標本、礦藏資源與文化的蒐集。」(Smith, 1999: 61)相對的，對許多原住民而言，對博物館可能連帶產生負面的感受，例如認為博物館是個以蒐集為名而偷走其知識、用具與聖物之處。

這種以研究對方為目的，進而認為得以文獻所建立之知識權威而取得為對方代言的正當性，這樣的論點，否定了被殖民者自身擁有解釋自己的可能性與治理自身的正當性。這也是令 Smith 以其毛利學者身分之所以對「研究」(research)一詞感到嫌惡的原因：「『研究』，這個詞本身，可能是原住民世界語彙裡最污穢的字眼之一。」(Smith, 1999: 1)因為有多少名目與計畫可以假研究之名進行、或以研究之果來證成其政策制定，但卻沒有進一步深入去詢問，被研究者自身對於這些所證成之事的感受，也就是回到前面 Latour 所言，來來去去的採集者對於前去之地不抱以情感，只著重於採集完畢後將之搬運、往上呈報的過程，只因為這才是符合以資本再換取資本的循環過程。

就因為「研究」這字眼背後帶有許多不單純只是研究而產生可為某種意圖所使用的累積資本（包括研究者本身所獲取的既得利益），而未顧及被研究者情感與各種長短期利益，Smith (1999: 191)便直言：「很顯然地是這

樣，務必記住，就歷史而言，原住民沒有看到研究對自己產生什麼正面的益處。」

Smith (1999: 183)同時強調：

毛利研究乃為這樣的歷史所標示，而形塑了毛利人對於研究的態度與情感。研究就在西方知識的製造、學院著作的本質、理論製造所暗指中，將毛利去人性化，在實踐上也特許西方認知的方式，然而卻否定了毛利及其知識、語言與文化的有效性。

Smith 的意思是，毛利原本就有自身的知識與實踐方式，卻在西方知識製造方式下被否定，而形塑對於研究的負面感受。然而，「研究」之於毛利社群等原住民族人，就真毫無存在必要與可取之處嗎？

二、「研究」之於原住民所具有之正向可能

事實上，Smith 所言並不代表她反對以原住民為主題進行研究，而是在意：是由誰主導研究？研究過程所採用的分類方式，是否以原住民知識的觀點及有效性作為基底？研究立場所產生的觀點與詮釋，是否從原住民文化的角度出發？Smith 便以 Kaupapa Maori 毛利研究主體性為例，一再強調：「所有的毛利研究，無論是個體或社群，都應該要著手起始於要為被研究者開創一積極正面的轉變。」(Smith, 1999: 191)換言之，被研究者最終得因該研究成果而能於原住民自決的治理性受益，而能產生正向的改變，才是考量一個毛利／原住民研究是否值得去進行的起始點。

Smith 的看法，簡明扼要點出「研究之所以值得研究、需要研究」的意義。如是一來，所謂分類、保存、安排、再現並蓄積於「儲藏室」(storehouse)的做法而將之備份回報給西方(Smith, 1999: 44)，就成了為了原住民而做(for)、為了做給原住民(to)以及與原住民一起做(with)的研究(Smith, 1999: 183)。經由做研究，原住民也能產生所謂加諸於此知識累積循環的資本，而

且是以西方知識所無法理解闡述與做到的模式來建立。以往宰制者與被宰制者之間力量的平衡便有機會得以移動、進而改變不平等的關係。

張培倫（2009）指出，原住民知識之解殖研究對原住民自身具有兩個目的：重構族群主體性與重構族群平等地位，這分成認同指向與權力／資源指向。認同指向係指，社會上對於原住民知識研究與學習有助原住民以自身眼光看待並發展其觀點：「此一掌握知識主權的模式，等同於重建族群文化認同在社會上的平等地位，不僅在知識產出上，也在各個社會層面爭取平等發聲的機會。」（張培倫，2009：35）至於權力／資源指向則表去殖民的原住民族知識研究會帶給主流社會調整看待世界之角度，有助原住民於整體社會之權力資源分配競合上獲得公平額度。

因此，研究原住民知識，「不但是一種為獨立平等的文化認同爭取肯認的過程，同時也是據此要求社會總體權力／資源分配結構進行重新調整以因應此一獨特認同的動作。」（張培倫，2009：36）以此應有的高度，看待由原住民以其主體性所產出之原住民知識，則研究不再只是純粹的學術文字生成，其成果更能對原住民在族群存續認同與權力資源分配之發展上產生調整與改變。

譚昌國（2003）並以其所為文探討之五位排灣族學者歷史論著，認為原住民學者憑其對地方與部落發展之關懷，展現在對其社會與文化變遷之研究上，較非原住民學者更具開創性。他認為原住民自身寫史除具有主體史觀與解釋權之外，還有另一意味，「而更長遠的關懷，則是幫助族人在歷史中了解 and 認同自己，進而建立族群自知與自信。」（譚昌國，2003：68）這與《炭火相傳》一書理事長序「傳給我們代代子孫且以此教育他們」（林時吉、陳文山，2009：4）、編者序「這一本書希望是部落年輕種子傳承文化教材的教育書籍」（林時吉、陳文山，2009：5）所提到族人出書寫書的理念不謀而合。

從去殖民觀點省思博物館與部落合作知識生產之道

那麼就前述白鷺部落出書的經驗，對應上述學者看法，可以歸整出哪些作法來趨向改善此一不平等的結構關係，特別是從博物館的角度來省思與部落合作知識生產之道？以下列舉最重要的三點作為討論。

一、博物館與部落發展互為主體的夥伴關係

在白鷺部落族人與外來研究者的共事過程中，顯現雙方對於彼此互有所需的關係中，共同朝向成書的目標來努力。2010年春天該書發表後，一起參與編寫的長老嚷阿嚷對此更是深有所感。而在2011年5月21日一場以來義鄉族人為參加對象的鄉志工作坊研習中，參加者就「部落文史寫作由原住民本身或由外來者研究何者為佳，分別列舉優缺點」此一議題，提出他們的看法。嚷阿嚷長老當時即代表該組學員，說出他認為這兩者皆有其侷限亦各有所長，因此互相需要對方以成事。

根據筆者當時在現場所得該組整理後之意見如下：原住民自身進行研究的優勢在於「對原住民主體性的回溯與建構比較深入了解及傳承意義」。至於缺點則在於「漢語的書寫思考模式與原住民思維不同，無法展現文化內涵」、「落入習以為常的窠臼，主觀意識形成另一個文化霸權」。至於「白浪的學者」參與研究的優點是「專業學術研究基礎」、「資源豐富」、「客觀分析」、「打破刻板印象（非侷限於歌舞）」；至於缺點則有「流於靜態展覽，並無回饋部落」、「學術研究（標本式）」、「翻譯限制的問題」。

從這裡可以看出，族人理解當族人以局內人研究者身分進行研究時，背後容易形成對哪些事務已有主觀看法的限制，這一點則非原住民研究者能在較無原先人際網絡包袱上以客觀分析來衡量、補足；非原住民研究者進行研究時向來予族人無回饋部落的印象，而當原住民研究者以其主體身分參與在其中且握有版權時，則進行研究一事就不會予人被掠奪的感受。前述 Smith 提出原住民視蒐集為偷竊的行為，則當回饋路徑隨著主事者身分改變而改

變，則「研究」就不會再被族人視為偷竊或掠奪，反而是累積部落與族群知識資產的作法，而能改變族人以往視研究無益處之觀念。

因而前述所謂原住民自身的努力，並不代表原住民必須排斥外來研究者的參與，而是原住民在以自身為主體與主動產生研究作為的情形下，可以邀請非原住民一起參與付出，以逆轉以往外來研究者挾其工具、能力、技術、頭銜、權威等建構原住民圖像的關係與作為。Smith (1999: 178)指出，由於原住民研究者仍舊缺乏之故，因而非原住民研究者在許多研究上扮有指導或帶領角色。

G. H. Smith 對非原住民研究者指出四種與毛利研究者一起工作時具有文化適切性的合作模式：導師模式(mentoring model)、採納模式(adoption model)、權力分享模式(power sharing model)、權能增長模式(empowering outcomes model)。導師模式係指權威指導與資助研究；採納模式係指，非原住民研究者長期併入毛利人日常生活並發展研究範圍之外的終生關係；分享模式為研究者「尋求社群支持協助以富含意義地支持一研究事業的發展」；增能模式則為，強調毛利人所想要知道的問題並具利益與幫助的成果。四種模式有其各自好壞不一的結果，也有政治配合的考量須審慎使用(Smith, 1999: 177)。上述模式都帶有促進原住民增長建構研究能力的目的。

因此同樣的，博物館與部落、外來研究者與原住民族人之間，也能視情形採用或調整選擇適合的模式，終極目的皆在於促進原住民獨立研究所需的思維與技能。就這些模式而言，博物館研究人員可以就技術增能方面指導、帶領、增加族人進行研究的能力，或就族人社群發展有關面向協助提報計畫，增加獲取資助與協助的機會等。此一不斷互動的過程即為發展終生關係，產出站在族人角度對其有利的成果。

二、博物館成為培力部落研究者的研究機構

Smith 以紐西蘭毛利人社群自行創辦民族大學、與當地大學合作進行研

究中心建置計畫、學院開啓原住民研究為例，指出各式於研究機構培育原住民研究人才的方式，重點在於經由體制提供原住民研究者實務訓練的作法及可能性。這類自辦機構或與友善的非原住民機構發展策略聯盟的方式，為鼓勵原住民學生發展研究興趣、指導論文寫作、接計畫發展研究、與部落一起工作等等。以 Kaupapa Maori 毛利研究概念為發展的作法，促進大量年輕原住民研究者產生學者團體互動、聚會、發表，形成支持體系的社群等等(Smith, 1999: 129-137)，這些作法帶給博物館的啓示是甚麼？博物館可以如何就各面向的操作，一起促進原住民知識生產研究的培力？

研究的產生，首先來自於有研究者進行研究。然而研究者如何產生？可以如何產生？不同於學院體制擁有更嚴格的審查要求，例如通過入學考試始具備入學資格亦或畢業結業須繳出論文始能獲得學歷的限制，博物館作為與學院並駕齊驅的研究機構，就培訓作法上應能擁有更多變通的彈性。例如國內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行之有年的「臺灣原住民訪問學者」獎助計畫即有參考之處，該辦法促進不少非學院出身的原住民研究者，能就自己專精處有所強化，提升更多研究能力，是一能促使所內研究資源為原住民利用的方式。因而博物館能否從其傳統功能如典藏、研究、展示、教育等面向，在研究人員陪同下，切中原住民研究者關懷的核心，經由討論、共事，透過雙向溝通及助益提升的進程，達到知識的產出與系統建置？

以下以表格提出白鷺部落自 2007 年至 2009 年成書之前，於各面向與史前館合作方式為例快速瀏覽，說明博物館可以就其相關核心業務與部落合作，特別是就研究出書方面，具有提升族人進行研究與資料蒐集建置的養成可能。

史前館與白鷺部落之首次合作為 2006 年工藝品巡迴展，當時安鷺山因為參加該館纖維創作研習，而願大膽嘗試將學員成果與家鄉族人工藝品結合成巡迴展，於是從該點開始蒐集尋訪部落長者之工藝創作，擬寫工藝家介紹與部落介紹作為展覽輸出與 DM 使用。這是他與博物館開始合作鍛鍊自我寫作蒐集資料之始（陳文山，2007）。之後基於驚嘆長輩之創作成果、想拉起

部落斷層的橋樑，因此在與長輩擁有更密切互動之後，他以白鷺協會名義成立青少年文化成長班至今，邀請這些耆老擔任講師，好將所學教給部落國中小學生進行體驗活動。同時也積極辦理舊部落或尋根活動等，不斷累積相關照片。這些國中小學生於該次展覽即開始義務擔任部落工作與文物館活動小幫手，透過這個青少年養成方式，於往後與安鷺山的部落工作及文物館策展前置工作形成密切的夥伴關係（林頌恩，2007a、2007b、2008、2012）。

2007年，安鷺山透過文物館執行辦理的老照片展覽，開始掃描建置白鷺部落老照片之數位檔案。2008年年底，為了籌備翌年春節 *maljeveq* 此五

表 1 2007 年至 2009 年間白鷺部落與史前館相關合作面向

年度	主題	博物館操作面向類型	細部工作與備註
2006	「用手去找・新織事」來義鄉巡迴展暨當地工藝特展	研究 策展	進行文案內容調查與書寫
2007	「我們在這裡—台灣原住民族生活影像聯展」：「傳承在來義—排灣族的生活影像展 ² 」	研究 策展	圖片蒐集 田野調查訪談、資料建立
	南和青少年文化成長班成立	教育	創造部落老少情感連結及知識傳遞之人才培訓
2008	<i>maljeveq</i> 祭祖大典籌備 ³	策展 教育 解說導覽培訓	祭典由來、禁忌、程序等基本資料撰寫成解說資料、提供導覽培訓
2009	<i>maljeveq</i> 祭祖大典進行	策展 教育活動 解說導覽執行 體驗活動	主題內容輸出、帶領遊客進行體驗活動與導覽解說
	部落文史調查出版	研究 出版	田野資料調查、訪談、書寫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² 該展主要為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所及原民會推動文物館活動計畫之委外輔導團隊所執行，主要提供圖片單位來源為臺大人類學系所及史前館所藏老照片。

³ 因為須具備某些條件的關係，*maljeveq* 此一祭祖大典僅在少數幾個排灣族部落舉行。白鷺部落長者認為以往學界多譯為「五年祭」的說法較為簡化，無法涵蓋該祭儀面貌故以祭祖大典稱之。

年辦理一次的祭祖大典，安鷺山說服長輩於祭典時增加週邊活動，方式是首先經由長輩蒐集整理祭典資料，將之轉化為訓練青少年進行解說導覽課程。2009年則與史前館研究人員就該筆資料來回修改撰寫成可轉化為DM與圖文輸出的內容，於祭典進行期間由國高中生於祭場旁擔任小小解說員，並大量拍攝累積重要畫面（陳文山，2009a、2009b）。

由於有這些年來的打底，累積了安鷺山進行文史調查的基礎能力，成為《炭火相傳》書中圖文內容的重要文稿，因此該書才能在短短不到半年時間完成調查、書寫、校對、排版、出版等繁瑣過程，他的研究與整合能力也在短時間內大幅躍升（陳文山，2010a）：

製作文史書這一年尤其是下半年，真的是我人生中非常爆炸性的工作量以及對許多事務的吸收及成長，因為我在這個過程中學到、知道很多很多以前從來沒有知道或注意過的事情，這些點點滴滴都是部落最寶貴的知識，是要傳下去的。在這個過程中，靠著長輩的記憶與口述加上照片的提供，還有工作小組的記錄拍攝、資料引用整理，以及不斷的校稿對稿處理美編與文字的問題等等，沒有畏懼許多來來回回的煩瑣事務，這些努力終於讓部落有史以來的第一本書籍《炭火相傳—白鷺部落文史紀錄》可以出版。

誠然，安鷺山的成長訓練主要歸功於他的學習意識極強、善於要求鍛鍊自我，而其養成亦非單單只基於與史前館合作，他也在與其他博物館及不同單位合作中不斷吸收成長⁴。然而從他的研究能力成長與部落事務參與來看，可以發現，博物館確實可以傾聽並站在部落的需要，思考如何就館務核心與發展可能性轉變成可協助部落發展的執行計畫，促進族人就近於自己部落進行研究，同時產生能量來陪伴更多在地與週邊族人進行研究。

以安鷺山為例，他不僅在此一成書過程於各方面有所成長，之後他亦從

⁴ 特別是與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各項合作，加深他在相關事務的學習與成長。

中產生未來著手於鄉志撰寫的前置作業，也就是以白鷺部落文史書經驗，試著去陪伴鄉內其他有心寫作成書的部落進行部落志調查研究。這是目前正在進行的方向，也是將「中心」與「擴散」此概念留在知識起源地的做法。

安鷺山將學得的技術與訪談的知識就近留在身上，繼續陪伴部落往下一階段前行；老人家也把他們對年輕一輩的信任與安心交託在他身上，一有甚麼可供記錄的資訊或機會，都會叫他前來採集，老青之間亦更有意識營造部落文史紀錄之場合。相對於前述 Latour 所謂把「土地」即能搬走的物件都帶走的方式，在此可視安鷺山把「技術」帶走、把「情感」帶回自己的出生起源地，建立起中心，且正在影響其他部落也產生自己的中心。儘管安鷺山並非如前述譚昌國所評析為接受過正統學院訓練的學者，然而前述人類學家補破杯的責任，很明顯已是由自己部落子弟接班下來，世代相傳的情感體現在他與老人家之間的互動（陳文山，2010b）：

繼續推動紀錄部落文史的動力，我想對很多人來說是來自於對生命的感動、對土地的感情、對後輩的責任、對自己的期許、對文化的熱愛，就是這樣的感覺繼續維持下去，努力付出、不求回報、拿得起放得下，路才會走得穩走得久。希望原住民在臺灣的歷史發展中，繼續以我們自己解釋自己的方式存在，也跟更多人一起分享我們各種美麗的存在。

而這樣不求任何利益只是為自己部落付出的責任心，也正是原住民社群希望能將知識傳續給自己後裔以達到促成部落福祉發展最企求的初心。因而這也是博物館能夠從旁參與培力原住民青壯輩研究者一部分的協力可能。

三、博物館作為出版協力角色以落實版權為部落集體擁有的作法

《炭火相傳》出版後，在博物館研究人員與協力歷史老師得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開始當年度獎勵出版文獻書刊暨推廣文獻研究的徵件訊息時，便告知年輕編寫者安鷺山並大力鼓勵他以協會名義去申請。2010 年計有 83 件角

逐申請出版品，其中使用政府預算類有 70 件，《炭火相傳》就是其中這 19 件獲得獎勵的出版品之一⁵（林頌恩，2010b）。

前述加拿大原住民 Ignace 與 Speck 強調知識版權回歸部落，這是促使部落管理自己命運的方式。《炭火相傳》的出版單位為代表白鷺部落的屏東縣來義鄉白鷺社區發展協會，因而此一智慧公財亦屬全體族人。這在安鷺山代表部落出席參加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的頒獎典禮時，與另外一組受獎者形成強烈對比。由賽夏族作者趙正貴所完成《賽夏族的歷史文化傳統與變遷》一書獲得首獎之一，惟該書出版單位係新竹縣文化局，因此當天上台受獎者亦由新竹縣文化局代表，而非作者本人。未來收藏該獎狀的單位自然也是公部門，而非作者所屬社群。

按照目前著作權辦法，作者只擁有著作人格權，至於著作財產權則屬於出書單位，若作者及其社群未來有相關使用考量，仍需比照其他想使用該書內容之個人與單位進程序上的接洽。這使得原作者及其社群無法在以部落有需求的情形下可自由使用內中資料，也更強化部落知識以部落團體作為出版單位的意義所在（林頌恩，2010b）：

然而這本書獲獎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意義。申請 ISBN 的出版單位是白鷺社區發展協會，文建會、原民會、縣政府、鄉公所、議員等是提供經費的協力，史前館這邊則為人力編寫培力，因此代表領獎的單位是部落組織而非公部門，白鷺社區發展協會也因此成為本次唯一一個原住民部落組織的得獎單位。這個由部落自己撰寫並出版的意義，將上下游工程統合於部落自主的發展，過程中匯集各方之力，而以部落為主體做呈現，讓部落建構自己歷史的主動性得以恢復，我想是這本書得獎背後最大的意義。

博物館同時也是推廣研究成果的出版單位。然而如何在與部落進行知識

⁵ 按照等級計有首獎四萬元、三萬元、兩萬元、一萬元與佳作等五類，該書排名第四等級獲得一萬元。

生產方面的成果上，轉變以往將採訪對方知識整理的結果化為館內出版品、而使對方社群失去著作財產權的作法，勇於打破前述 Latour 中心累積的模式，改採逐步陪伴不同部落，使之生產、建立為自己所擁有版權的出版品／產物，使各部落形成自己的知識累積中心。如是一來，就能進行後殖民理論所強調要打破中心與邊陲的概念，避免提供知識來源地最後反被掌握資源集中的知識集散地遭致邊陲化之可能。

當 Smith 提出如下呼籲：「當被研究者成為研究者時，那麼研究會發生怎麼一回事？」(Smith, 1999: 183) 意味著當原住民以所謂圈內人(insider)同時兼具局外人(outsider)的研究位置來進行研究時，許多情況將有所翻轉(Smith, 1999: 193)：

這是「原住民參與者的觀點」，看待過去研究怎麼應用在我們殖民上。但這也是有關於了解研究如何提供系統化的方式來了解自身的境況，回應我們自身的問題，幫助我們作為社群來處理我們的問題及發展自身。投入在原住民議題研究上的討論，目的在於發現聲音、給出聲音來表達所關心、恐懼、欲求、熱望、需要及提問。當原住民成為研究者而不只是被研究者時，研究的活動設計就轉型改變了，所框架的問題是不同的，事務的順序排位分級也不一樣，問題也會被不一樣地界定，族人也會以不同的關係及位置來參與。

Smith 界定了，原住民以研究者角度來參與研究，就會產生自己的觀點，研究的目的自然就會放在發展自身福祉上，而並非去成為殖民者以「他者」角色用以發展其自身資本利益上。而原住民以主導位置參與研究的目的，也在於強調是為了給出聲音來表達情感所需諸如關心、恐懼、欲求、熱望、需要及提問等，而這些顯然不是以往僅在意記錄分類的研究者所著重的情感面向，而這才是被殖民者最在乎具有族群生存的指向性問題。

因此博物館在執行與原住民社群相關之業務與研究上，也要反過來探討，於設定計畫之本質是否具有實質關心族群生存的指向，是只為了博物館

的需要而重蹈以往殖民時期作為，而單方面要求原住民社群配合，以完成館方執行自身計畫的意志呢？亦或能站在原住民生存的需要與之討論設定計畫，過程中以引發原住民更多參與及能力養成爲目的而共同協力，促成研究順位與議題介定的改變呢？相信後者是對雙方發展與互動而言是更爲良性的做法。

以上所列三種作法，相信可以在博物館業務執行方式的一定範圍裡，達到前述 Smith 所強調以原住民爲主體的研究，必須是爲了原住民而做、爲了做給原住民以及與原住民一起做的研究，而在研究產出上達到原住民研究最在意達致原住民增能與自決的福祉權利。

如是一來，博物館的角色不再只是前述所謂物件與知識的「儲藏室」(storehouse)，而可轉爲對於儲備人員能力的「發電廠」(powerhouse)，促成各地各中心的形成與能量、知識的交流運輸，打破前述 Latour 以勢力者作爲累積資本之中心的以往生產方式。

結論

後殖民研究裡頭強調的去殖民工作，就研究行爲與關係而言，強調打破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不平等關係。黃應貴認爲要處理此一分屬不同群別的不平等關係，他於寫作當年認爲人類學界還沒提出解決方法，惟一可行的是（黃應貴，1994：24）：

仍在於 D. Hymes 所提的去幫助被研究者了解人類學的研究與知識，以縮短其間掌握及應用人類學知識之能力的差距，並緩和依此而來所產生的不平等關係。但要達到此目標，人類學家最容易著手之處，仍在於經由長期而深入的田野工作，建立彼此之間的誓約式關係，使被研究者有更大的可能「人類學化」，而有助於其未來文化的開展。

D. Hymes 與 Smith 所見略同，即培育原住民自身從被研究者成爲研究

者。黃應貴認為達此目標最容易的方式，是人類學者竭力將研究對方之成果做到最佳以使之「人類學化」。然而如何不在過程中，採行以往將原住民視為轉述客體而由學者代為敘說的方式，因而此一所謂長期深入並與對方建立起誓約關係的模式，更需進一步著力於透過彼此長期共事的過程，促使原住民從研究之道走入認識自己以往所未認識社群面貌的新境界，從而於調查及書寫中建立起系統知識。這一點就博物館結合成人教育培力計畫以發揮社會教育之功能面向而言，是博物館發展原住民社群工作可嘗試推行的主題。

就這一點，史前館於白鷺部落成書所擔任的角色或可提供一些經驗，雙方於合作知識生產方面，著力於發展互為主體的夥伴關係，博物館從中成為培力部落研究者之機構，並以出版協力角色促進部落掌握自身知識版權。可看出博物館能夠從以往「儲藏室」的角色，嘗試轉換成為「發電廠」，從中促成部落建立自己的知識中心。

最後，本文願以 Speck 一句批評與期待作為結尾，以此提問強調後殖民主義重視的實踐作為。Speck 在批判人類學者時指出：「人類學有這工具可以去成事，只要任何人有這勇氣去拿起來。我認為問題出在於缺乏勇氣。」(Ignace et al., 1993: 184)相信這句話不只適用於對人類學研究的期待上，也適用在處身博物館環境工作的研究人員身上。當博物館界研究人員早已擁有可成事的工具，而進行方向亦明擺在眼前時，下一步便是以博物館於業務推行上所能帶入轉變的計畫開始著手，用勇氣去實現。

參考文獻

- 王志弘等譯，Said, E.著，1999。東方主義。臺北：立緒。
- 王嵩山，2005。想像與知識的道路：博物館、族群與文化資產的人類學書寫。臺北：稻鄉出版社。
- 丘延亮，1997。日本殖民地人類學「臺灣研究」的重讀與再評價，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8：145-174。
- 吳叡人譯，Anderson, B.著，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
- 林時吉、陳文山，2009。炭火相傳——白鷺部落文史紀錄。屏東：屏東縣來義鄉白鷺部落社區發展協會。
- 林頌恩，2007a。趕快(irimu)！鍛鍊部落的臂膀——以纖維創作來義鄉巡迴展於南和部落為例，談建立在地團隊的必要性及青少年於策展過程的教育參與，《發現》史前館電子報，99，取自 http://beta.nmp.gov.tw/enews/no99/page_03.html（瀏覽日期：2012年6月10日）
- 林頌恩，2007b。營造下一代對文物館的記憶——以來義與奇美影像展為例看青少年的佈展參與，《發現》史前館電子報，119，取自 http://beta.nmp.gov.tw/enews/no119/page_03.html（瀏覽日期：2012年6月10日）
- 林頌恩，2008。綿延不斷的創造力，不只 vuvu 還有我們這一輩！——來義鄉排灣族服飾展活動，HoHaiYan 臺灣原 young 原住民青少年雜誌，31：44-49。
- 林頌恩，2010a。小老編部落文史書製作秘辛記事，與白鷺，《發現》史前館電子報，172，取自 http://beta.nmp.gov.tw/enews/no172/page_02.html（瀏覽日期：2012年6月10日）
- 林頌恩，2010b。繼續用力寫下去——記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獎勵文獻書刊頒獎典禮《炭火相傳》獲獎心得，《發現》電子報，193，取自 http://beta.nmp.gov.tw/enews/no193/page_01.html（瀏覽日期：2012年6月10日）
- 林頌恩，2012。召喚、穿透、協商、共生——從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的發展探討文物館與部落的結合，博物館學季刊，26（4）：41-64。
- 姚人多，2001。認識臺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臺之殖民治理性，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2：119-182。

- 陳文山，2007。多麼美的第一次，《發現》史前館電子報，98，取自 http://beta.nmp.gov.tw/enews/no98/page_01.html（瀏覽日期：2012年6月12日）
- 陳文山，2009a。分享我們感動的故事—2009白鷺部落 maljeveq（五年祭）（上），《發現》史前館電子報，160，取自 http://beta.nmp.gov.tw/enews/no160/page_02.html（瀏覽日期：2012年6月15日）
- 陳文山，2009b。分享我們感動的故事—2009白鷺部落 maljeveq（五年祭）（下），《發現》史前館電子報，161，取自 http://beta.nmp.gov.tw/enews/no161/page_02.html（瀏覽日期：2012年6月15日）
- 陳文山，2010a。記憶編織與拼圖，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發現》史前館電子報，172，取自 http://beta.nmp.gov.tw/enews/no172/page_03.html（瀏覽日期：2012年6月18日）
- 陳文山，2010b。感動的力量—記《炭火相傳》得獎心得。《發現》史前館電子報，193，取自 http://beta.nmp.gov.tw/enews/no193/page_03.html（瀏覽日期：2012年6月18日）
- 黃應貴，1994。從田野工作談人類學家與被研究者的關係，山海雙月刊，6：18-26。
- 孫大川，2000a。山海世界：臺灣原住民心靈世界的摹寫。臺北：聯合文學。
- 孫大川，2000b。夾縫中的族群建構：臺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和政治。臺北：聯合文學。
- 張培倫，2009。關於原住民知識研究的一些反思，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5：25-53。
- 蔡源林譯，Said, E. 著，2000。文化與帝國主義。臺北：立緒。
- 譚昌國，2003。歷史書寫、主體性與權力：對「排灣人寫排灣族歷史」的觀察與反思，臺大文史哲學報，59：65-96。
- Ignace R., Speck, G., & Taylor, R., 1993. Some native perspectives on Anthropology and Public Policy. In: Dyck, N. & Waldram, J. B. (Eds.), 1993. Anthropology, Public Policy and Native Peoples in Canada, pp. 166-191. Montreal, Canada: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Latour, B., 1987. Science in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G. H., 1990. Research Issues Related to Maori Edu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NZARE Special Interest Conference, Massey University, New Zealand.

Smith, L. T., 1999. *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London and Dunedin: Zed Books and University of Otago Press.